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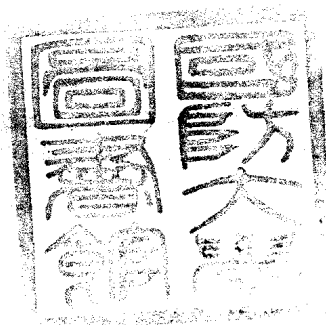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四十四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年·北京

(京)新登字071号

中共党史资料(第四十四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百善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 8.125印张 150千字

1992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500册

ISBN 7-80023-459-2/K·448

定 价: 3.50元

目 录

回 忆 录

- 西北局的光荣使命 傅 钟 (1)
回忆鲁迅 楚图南 (37)

人 物 介 绍

- 叶剑英的读书生活 张廷栋 (42)
记林月琴 黄 瑶 (62)

专 题 资 料

关于毛泽东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 战略思想的历史考察 盖 军 (100)
1962 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邓礼峰 (139)

从中英联合声明到香港

基本法的诞生 魏 刚 (169)

会议介绍

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

和三月会议 王秀鑫 (194)

史料研究

红军长征史史料研究概述 曾景忠 (212)

小 资 料

武汉工人纠察队的建立和失败 张光宇 (248)

西北局的光荣使命

傅 钟

1936年7月，党中央为加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的统一领导，批准成立中共西北局。西北局以朱德、任弼时同志为核心，挫败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保证了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会师陕甘的胜利，为红军三大主力完成长征，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在大西北，做出了贡献。这段艰难历程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朱总司令的英明决策

1936年刚进7月，红二、六军团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了！陕北发来了由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68位同志和一方面军、陕甘宁红军、苏维埃政府、人民团体、赤卫军、少先队等10个单位联合署名的贺电。贺电说：“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与全国抗日人民、抗日军队、抗日党派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挽救中国于危亡，解放中华民族于日本

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与此同时，红二、六军团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红二、四方面军原已商定的计划，红军总司令部作出了进军陕甘的部署：先以左、中、右三路纵队穿过草地，到松潘包座一线集结；尔后向甘南的岷州、洮州、西固（今舟曲）地区进攻，打开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通道。行进序列是：四方面军先机出动，李先念同志率骑兵师和八十九师为先遣军，在前边筹粮；徐向前同志率四方面军总部、九军、四军十二师、独立师和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为中纵队，2日从炉霍出发；董振堂同志率五军团和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为右纵队，10日由绥靖（即大金）、崇化地区出发；朱德总司令率领四军的十师、十一师和三十军的八十八师为左纵队，3日从甘孜地区出发。贺龙、任弼时同志率领的二方面军（包括罗炳辉同志率领的三十二军），分两个梯队，沿左纵队的路线跟进，7日从甘孜等地出发。我当时是从炉霍率领慰问团到甘孜欢迎二方面军的，随左纵队的四军行动。

对四方面军来说，这是第三次过草地，而且路程最长，要走1个月，其艰难困苦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部队已经过几个月的休整，战斗情绪很高，由于二方面军的到来，更加坚定了北上的信心。整个部队情绪确如后来任弼时同志向党中央报告的那样：“政治军事工作都有极显著的进步与成绩”。然而令人焦虑的是，张国焘仍没有停止反党活动，他向二方面军的领导干部游说，散布对党中央的不满，进

行挑拨离间，企图拉拢人同情他，在良好的统一、团结的氛围中制造混乱。

针对张国焘的行为，朱总司令在会见二方面军的主要领导时，让他们了解了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分裂红军的事实真相及其过程，并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要任弼时同志随总司令部行动。无疑这是一个十分英明的决策。

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1年来，朱总司令为了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红军全军的团结，使南下红军重新北进抗日，正气凛然地、从容不迫地同张国焘进行周旋，费尽了心血。让任弼时同志留在总司令部，显然会更有力地抵制张国焘的错误影响，大大加强党的领导。左纵队乃至整个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得知这一决定后，无不喜形于色，对前途充满希望。

我和任弼时同志相识于1926年。那时，他是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到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我在中山大学任学生支部局副书记。有一天，在共产国际大楼，领我去见他的苏联同志说：“这是你们的代表！”后来我们交谈过多次，结下了诚挚的友谊。1930年，我回国在上海中央军委工作，他是长江局委员，开会常在一起。他严格要求自己，其原则性和组织纪律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张国焘回国不久，提出要到军委看文件，任弼时同志说：“他看文件到中央组织部去，不要到军委来。”对于张国焘，他是知道底细的。1931年后，我从鄂豫皖到川陕，对张国焘在掌握政策上的过“左”和不搞党的建设，就积了一堆

意见。同一方面军会合后，他和党中央搞不拢，好端端的四方面军由8万人被他弄得剩下不到一半……压在我心头的郁闷和痛楚日益沉重，恨不得立刻向弼时同志说个痛快。

草地竟夜谈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晚上，任弼时同志主动找我谈话。他讲了二方面军7个多月的艰难行程，也称赞四方面军的《二次北上政治命令》和《北上抗日政治工作保障计划》搞得不错。他对我很信任，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发的小册子，讲和党中央的分歧，说一方面军“不辞而别”，这样散布不和，损害团结，为什么要发给我们？那是不应该发的。随后，他开门见山地问我：“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们为什么不走呀？”我不假思索地说：“不知道。”他很惊讶。我说当时确实如此，不知道怎么闹到了那种地步。他仔细地听我说了我的经历和所见所闻。

毛儿盖会议后，我在右路军前敌指挥部任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是陈昌浩同志，徐向前同志是总指挥。尽管张国焘对我们说过一些挑拨离间的话，但大家都知道他的为人，并未深究，而且对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完全同意的。所以王稼祥同志说：“看来你们和张国焘是有争论的。”但这段时间令人不安的是，陈昌浩同志非常傲气。我看到他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面前也是旁若无人，对党中央、一方面军说些令人十分难堪的话。我看不下去，表示了意见，陈就要

我离开政治部，到包座前线部队进行战地工作。随后李卓然同志也去了。9月11日清晨，突然来了骑兵通信员，送来陈昌浩同志的“特急飞传”的信件。里边是张两指宽、4寸长的纸条，上面写着：傅钟、卓然：赶快回来，中央夜里秘密开走，去向不明。他们丢下我们“开小差”，用意何在？飞速来议。

这突如其来的事变，真是霹雳盖顶，卓然和我都懵了！象被窒息了一样说不出话来，只是默默相顾，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儿才想到：赶快走，回巴西！于是丢下带来的工作人员，我和卓然快马加鞭，往巴西飞跑。到达巴西已时过中午。见陈昌浩同志在大庙里，庙里坐了好多人，徐向前同志身体不好，斜卧在门板上。我靠近他坐下。陈昌浩同志开始讲话，神情暴躁至极，说中央“右倾”，“怕死”！丢下我们“逃跑”了！许许多多难听的话都脱口而出。人们听了更觉茫然，心神无主，难过极了！昌浩说完，问谁有话讲？我说没有，卓然也说没有。向前同志难受得很，叹气，无语。天近黄昏，陈昌浩宣布南下，口号是“打回通南巴！”要政治部对部队进行动员。我问昌浩，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昌浩说：你不必担心，我们还有几个军，自有出路！你们搞好政治动员。在庙外草场上，我面对部队说不出话来，心慌意乱，只讲了讲行军注意事项，什么绑腿要打好呀，脚布要包好呀，防止“烂脚病”呀，要发扬阶级友爱呀，东一句西一句，言不由衷，匆匆结束。

第二天，黎明即起，在凄风苦雨中南下，人们的心象被浓厚的乌云紧紧包裹着，部队情绪和北上完全相反。走了10多天才知道，原来不是去通南巴！待到了板阳，10月初，张国焘、朱总司令从阿坝方向来到卓克基，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后改为三十二军）又会合在一起，七八万人，浩浩荡荡！但想到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已远去北方，不免感到孤单和不安。徐向前同志说过，合而再分为兵家所忌。但张国焘是听不进这种意见的。有天晚上，他突然召集会议宣布成立“中央”，自任党的军委的“主席”，一下子就乱了！胡说的，乱喊的，混乱极了！张国焘闹独立，搞分裂，这算坏到了顶！

弼时同志是敏于事而慎于言的。听完我讲的过程，严肃地问我：“北上有决议没有？”

我说：“有。”

“有，为什么不执行？”

弼时同志这个提问，一针见血，刺中我的思想深处。尽管草地的凌晨格外寒冷，我身上还是不由得冒出了汗。关于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在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上，党中央都作了决议或补充决定，其中有两个会议我也列席了，但却没为执行和维护它进行坚决斗争。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过失，后来我多次为此作过自我批评。但这天晚上，弼时同志没有再说什么，只要我明天到总司令部机要科去看电报，说：“凡我看过的你都可以看。”

看过电报才知道，原来在一、四方面军分开前后，有不少重要事情，但我根本不知道，不是弼时同志打破张国焘的封锁，我还是被蒙蔽着。比如：中央率一、三军团到俄界后，不仅等了3天，来电7次，规劝张国焘放弃“南下”，跟随北上，而且直到9月18日，彭德怀、聂荣臻同志等还致电张国焘，告知他们已占领甘南的大草滩一线，当地的物资丰富，汉、回民众热烈拥护红军，“请你们立即北进”。显然，中央一直是坚持两河口会议精神，希望、等待并准备接应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对争取张国焘一起北上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所以弼时同志再次和我长谈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这对我启发很深，彻底分清了是非。

关于张国焘自立“中央”问题，弼时同志说已在李卓然同志那里了解过。我说，那个委员名单，全是张国焘和黄超搞的，别人概不知道。那天晚上开会，事先都不摸底，陈昌浩同志也不晓得要干什么。经过10来年艰苦奋斗和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创造的红军，眼看分裂到这种地步，谁不痛心叹惜呢？所以不管当时一些同志胡说了什么，胡喊了什么，都是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所使然，党会理解的，历史会澄清的。弼时同志就是这样，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团结了所有同志。我把那次会上的记录给他看过，他明确指出：“责任全在张国焘，事是他干的，人是他定的，你们谁管得了？”后来，弼时同志没有为此批评过哪个同志。

对我则非常诚恳地说：“按照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参加党内斗争。必须考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的！我们还在长征当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他的这些话贵如金石，在我心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不仅使我经久不忘，而且每想到它都会引起新的震动。

有一天，弼时同志当面告诉张国焘已和我谈过话。张国焘满脸不高兴又不好明讲，只是说，可以再多找几个同志谈谈。还指名可以找谁谈谈。弼时同志说，和傅钟同志还没有谈完，以后再找别的同志。他清楚张国焘的用意，是要让听他的话的人来施加影响，混淆是非。弼时同志的明确答复，既是保护我，也击破了张国焘的圈套。

弼时同志继续和我谈的，是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问题。在那些天里，张国焘一直散布：他取消了“中央”，和中央那边是平等的协商关系。说是陕北那边改称西北局，这边是西南局，象上海局、北方局一样，都由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统一领导。对此，弼时同志只是静心听没有说过什么。这天晚上他向我了解为什么这样提出问题？自立“中央”，已是我们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分裂危机，既然宣布取消了，为什么还不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我向他汇报了问题的由来和变化过程。

张国焘是1935年11月中旬南下红军打下芦山县城之后公开打出“中央”旗号的，党中央严厉批评了他的分裂主义行为，指令他不得再自称“中央”。1936年元旦，毛泽

东同志给朱德同志的新年贺电说，不仅已和上海局发生联系，也同国际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自然，对于张国焘，这也是个警告。不几天，张闻天给张国焘来电话：“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这算是直言相劝了！到1月下旬，中央电告“十二月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要点时，从共产国际归来的林育英同志来电肯定党中央是正确的，也要张国焘取消自立的“中央”，成立西南局，直属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同志等本来就反对他自立“中央”，这时也都劝他接受林育英的“通融”办法，目的是维护党的统一，早日结束分裂状态。但张国焘坚持反党立场，又要诡计，一面表示愿谋党的统一，一面却提出这里是西南局，陕北（党中央）那边要改为西北局，由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他还是那个不承认党中央、反对党中央统一领导的主意。

弼时同志不了解这些情况，说5月20日中央有过电报谈了与张国焘的关系，“暂时采用协商方式”，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而以和谐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中央没有讲与他是平行的“局”之间的关系，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关系，而且我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是党中央派出的，怎么能颠倒过来领导党中央呢？

弼时和我都会俄语，这有利于我们把心底深处的话，包括直接批驳张国焘的话都可以无所顾忌地说出来。对于张国焘破坏党的统一，他极为愤慨，说：“搞派别活动是张国

煮的老毛病，斯大林都知道，想不到会发展的这样严重。”他认为最迫切的问题，是维护党中央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他用俄语说，列宁是非常重视统一问题的！列宁说过，统一对工人阶级是无限宝贵的，无限重要的，在斗争中是最伟大的武器！而没有统一的领导中心，党的真正统一是不可能的。我们再不能让张国焘破坏党的统一了！弼时同志这种坚定的鲜明的维护党的统一的态度，对我教育极为深刻。

经过几次和弼时同志的竟夜长谈，使我对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党内制造的政治上的阴霾、思想上的糊涂、组织上的混乱有了深刻认识，一些问题也得到了澄清。按照弼时同志的见解，我和王建安、袁克夫等四方面军政治部的高级干部作过长谈。他们完全赞成弼时同志的意见，并积极主动地在部队中进行了团结一致和维护中央统一领导的思想教育。这样，指战员的精神面貌显得生机勃勃，对二方面军同志的感情更加亲热。

“太阳万岁！”

不远就是噶曲河了。连日阴雨、闷热的天气，被骤起的风吹得清爽起来，霎时乌云也散了，久违的太阳露出火红的圆脸，把灿烂的阳光洒满草地。走在队伍中的刘伯承总参谋长情不自禁地高呼一声：“太阳万岁！”这句话表明了人们的共同心境，于是长长的行列上空，象有万顷波涛

喧嚣一样，连连响起“太阳万岁！”“太阳万岁！”的喊声。接着笑声、歌声也飞扬起来。曾经旅欧的、留苏的同志们，有的用法语唱《马赛曲》、《国际歌》，有的用俄语唱起了沙皇时代革命志士的歌：

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

向着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已消灭，

万丈光芒在前头！

尽管谁也不是够格的歌手，弼时同志在合唱中还总比别人慢半拍，但年轻的战士们听了，身上显得轻快了许多。

过嘴曲河小休息，廖承志（当时叫何柳华）同志来了，掏出铅笔和纸问“哪个要画像？”刘伯承同志要他给画，还要他把岸边的渡船也画上。许多同志围上去看他运笔，称赞他画得好。接着，给我画了一张侧面的头像，下边签上了时间地点：“11.7, 1936, 绒玉”。这幅画我一直保存着。当时若不是很快出发，他还可以给人多画几张的。刘伯承同志和我用以酬劳他的，是倒给他半袋子青稞。他诙谐地喊着：“卖画罗，公平交易！”这期间，由于张国焘推行错误的肃反政策，他还被看押着，但由于朱总司令、弼时同志的关照、保护，已有若干“自由”，不仅有“新闻电台”大量的译电、编辑工作，还常常出“队”执行画马克思、列宁的像、布置会场等任务。他在被看押的队列中规规矩矩，一出“队”工作，就显出幽默、乐观的本色，走到哪里，哪里的愁云就被他赶个精光。

5月间在炉霍，举行有朱德、刘伯承、罗世文、张琴秋等同志主讲的“世界政治经济研究”讲座时，廖承志同志曾是《东方殖民地革命运动》、《关于国民党》、《日本问题》的讲演人。他以丰富的知识和精辟的分析，提高了大家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认识。这个讲座，是为迎接全国人民抗日斗争高潮的迅猛发展举办的。人们通过这个讲座，加强了拥护党中央正确路线——开赴大西北抗日前进阵地的思想基础，筑起了抵制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反对北上错误的思想防线。弼时同志对此是肯定的。在这当中，廖承志、罗世文和朱光同志编译并刻印的新闻材料起了很大作用。

队伍天天在广阔的草地上行进，不见人烟，不见村庄。有时我问伯承同志：今天走多远？他总是说，听太阳指挥，它落山，我们宿营。

求 吉 寺 会 议

7月27日，在阿木柯河（今牙磨河）畔，接到中央来电，批准建立中共西北局。西北局委员有：朱德、张国焘、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傅钟、李卓然、曾传六、张琴秋、王维舟、董振堂、罗炳辉、何长工、黄火青等20位同志。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西北局只设组织部，确定由我任部长。我当时是没有军事职务的。这主要是弼时同志的意见。后来在西北局下达党务工作的文电中，在张、朱、任